

# 中国佛经翻译与西方圣经翻译的相异性

◎衣志梅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分别是中西方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二者虽在材料、翻译理论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又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之处。

**关键词** 佛经翻译 圣经翻译 相异性

翻译的历史,可以说从原始人类开始以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那一天就开始了。在中国,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以佛教经典的翻译开始的。佛经翻译起于汉魏,以隋唐时最盛,到宋元结束,达千年之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的《圣经》翻译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对西方各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两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经典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历史,虽然二者在材料、文化移植、翻译理论的发展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于中西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翻译理论,以及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相异性。

第一,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到了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灾害连年发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佛教宣扬人生极苦,宣扬因果报应、人的悲欢离合前世所定等等。这些观点迎合当时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企盼宗教的心态。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受到欢迎,佛经的翻译也受到广泛重视。而西方翻译的第一发展阶段却与中国大不一样,古罗马时期翻译的主流是世俗作品,不是宗教作品。古罗马不像中国,他们缺乏自己的文学传统,因此当罗马人战胜希腊人夺得欧洲霸主地位后,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翻译借鉴希腊典籍的需要。即便是在宗教翻译领域,与导致中国接纳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大不相同的,基督教传入欧洲,并不是因为它能与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即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相通、相融。

第二,翻译理论上表现出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区别。我国译论的第一次高潮即佛经翻译中的悟性思维倾向较为明显。一个主要表现是,翻译者们在谈译论时,往往凭兴趣所致,除道安、玄奘等少数人提出过“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十一步”等带有理性归纳印记的见解外,大都没有分门别类

地、系统地阐述翻译问题的意识。译论者们也往往把翻译质量的优劣好坏完全系于译者的个人天赋和语文才能,而不甚过问翻译过程中有没有译者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相比之下,西方在翻译理论上则呈现出较明显的理性思维倾向。主要表现为:注重对翻译客体即原文作者与文本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包括对作者意图、文本形式和内容等),考虑读者因素。例如,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一文中指出,任何用拉丁语翻译希腊雄辩大师德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能用德摩西尼语言和风格进行演说。无疑,西塞罗一方面强调了译者必须首先清楚原作风格这个“客体”,同时也强调了“(拉丁文)学生”即译文读者这个受体。

最后,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表现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含蓄性与模糊性。表现在翻译上,则用词比较简洁精炼,语义往往经过高度浓缩,让读者慢慢去领会体味;西方则不同,其思维方式讲究分析性、明晰性与精确性,重方法、重形式、重概念、重流派,体现在翻译上,则用词遣句讲究明晰精确,语义的表达要求一一对应,完整到位,即使是运用取舍变易的表述技巧,也不能以牺牲原文的内容或改变涵义作为代价。中国人注重的是语言及翻译的实用性,而不注重其规律的总结和理论的升华;西方人则特别强调事物的理论性,注重规律的总结和理论的升华,对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就必须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予以分析。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佛经翻译与西方圣经翻译各自的特色以及存在的差异。但当代的西方译论异彩纷呈,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只要我们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国的译论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 参考文献:

-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2]付桂佳.中西第一次翻译高潮的对比.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